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实用教程

修订版

江锡铨 曹金林 主编
江锡铨 修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209.6/38

2007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 实用教程

修
订
版

江锡铨 曹金林 主编
江锡铨 修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实用教程 / 江锡铨, 曹金林主编. —2 版
(修订本).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3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ISBN 7-81047-212-7/I·3

I. 中... II. ①江... ②曹... III. 文学史—中国—
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 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635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实用教程
主 编	江锡铨 曹金林
责任编辑	张纯一 盛晓霞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9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 601—5 6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7-212-7/I·3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导 论
中国现代文学
的历史发展

- 一 文学革命与“五四”时期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1
- 二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7
- 三 抗日战争时期和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文学/10

第一章
鲁迅——中国
现代文学的
奠基人

-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15
- 第二节 《呐喊》、《彷徨》/17
- 第三节 《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24
- 第四节 杂文/30

第二章
郭沫若

-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44
- 第二节 《女神》/45
- 第三节 《前茅》等其他诗集/52
- 第四节 历史剧创作/55

第三章
“五四”时期及
20 世纪 20 年代
的其他文学创作

- 第一节 胡适与“初期白话诗”/61
- 第二节 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及其他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65
- 第三节 郁达夫及创造社作家的创作/78
- 第四节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83
- 第五节 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与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87

第四章
茅 盾

-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102
- 第二节 《子夜》与长篇小说创作/105
- 第三节 短篇小说/111
- 第四节 散文和文学评论/115



第五章
巴 金

- 第一节 前期创作/122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26
第三节 从《火》到《寒夜》/130
第四节 短篇小说和散文/133

第六章
老 舍

- 第一节 初期的创作/138
第二节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43
第三节 通俗文艺、话剧创作及其他/146

第七章
20 世纪 30 年代
的其他文学创
作(上)

- 第一节 蒋光慈、柔石、叶紫的小说/152
第二节 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的小说/160
第三节 萧军和萧红的小说/169
第四节 李劫人、沈从文等的小说/173

第八章
20 世纪 30 年代
的其他文学创
作(下)

- 第一节 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创作/179
第二节 臧克家、戴望舒等的诗歌/186
第三节 散文创作/194
第四节 田汉、洪深的戏剧创作/200

第九章
曹 禺

- 第一节 《雷雨》/206
第二节 《日出》和《原野》/211
第三节 《北京人》及其他剧作/216



第十章
抗战时期及
40年代的其他
文学创作(上)

- 第一节 艾青/222
第二节 沙汀等的小说创作/230
第三节 夏衍等的戏剧创作/239
第四节 “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派”/247
第五节 散文创作/255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及
40年代的其他
文学创作(下)

- 第一节 赵树理和赵树理方向/261
第二节 田间、何其芳、李季等诗人的创作/268
第三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273
第四节 解放区其他文学创作/279

后 记

/286

修订版后记

/287



■学习提示■

导论部分概述了中国现代文学 30 余年发生、发展的历程,着重讲述了其间的文学运动、文艺思想论争与斗争以及重要的文学现象。学习导论部分,应重点掌握: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深入过程;新文学阵营与复古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与斗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背景、过程和倡导者们理论认识的局限;“左联”的历史功绩;抗战及 20 世纪 40 年代国统区、解放区、“孤岛”及沦陷区文学各自的特点与成就。

一 文学革命与“五四”时期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自此,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但辛亥革命仅只推翻了满清统治,取消了帝制,并未能根除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也未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而将政权拱手交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导致了又一次历史大倒退,国家民族再次处于危难之中。当时,社会上继续推行尊孔读经,文化、文学仍在封建传统思想的控制之下,旧文学、旧文化、旧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深感思想启蒙乃当务之急。他们遂通过创办报刊、新学校,利用、改造旧有的宣传舆论工具,发表言论,大声疾呼,向民众宣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思想文化。这种广泛的思想启蒙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文学革命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5 年 9 月,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思想文化刊物《青年杂志》(1916 年第 2 卷第 1 号改名《新青年》),建立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阵地。发表在该杂志第 1 卷第 1 号上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



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具有先导性的号召，因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实际上都包括在这六项希望中了。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而将办刊宗旨定位于推进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斗争。对于科学民主的呼唤，对于封建思想道德的批判，势必会引发对作为旧思想、旧道德的“载体”的封建旧文学的批判，引发中国文学内部的变革要求。1915年9月，也就是在《青年杂志》创刊的同时，胡适写了一首长诗，与友人谈诗论文，其中透露了他对即将涌出地平线的文学新潮的强烈感应：“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其具体的内涵与以后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不完全相同，但使用“革命”这个字眼，说明他已预感到了这次文学变革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强度。

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首揭义旗，倡导文学革命。发表在1917年1月《新青年》上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针对封建旧文学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的通病，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胡适又指出，白话文学必然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作文作诗亦应以白话取代文言。这些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触及了当时反封建思想斗争的要害问题，起到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作用。同年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观点更加鲜明，态度更为坚定。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成为当时文学上破旧立新的响亮口号：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同于《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眼于文学形式改革的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对整个封建旧文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即不但否定旧文学“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形式，也反对其“委琐陈腐”的封建思想内容。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立场出发，把文学革命当成“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武器。“文学革命”的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钱玄同，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文学革命主张的补充与丰富。1918年起，《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

^① 《答王庸工书》，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通信栏，1915年9月。

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这样,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学统一战线,共同向封建旧文学开战。1918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也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学统一战线和文学革命的影响。

新文学统一战线建立后,除了反击封建守旧派的进攻,还集中相当力量,组织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等的旧文学及旧戏曲。与此同时,新文学阵线又积极开展了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使“破旧”与“立新”得以紧密结合。胡适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0个字作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新文学必须以白话为“工具”。胡适同时强调,新文学工作者应广泛接触社会生活,注重“实地的考察和个人的经验”,注重学习“西洋的文学方法”。由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有关新文学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这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反响。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章。《人的文学》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角度对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提出具体要求,认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则进一步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这一口号,主张“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迹,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些见解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初步确立,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收获。随着关于新文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探讨的开展与深入,陆续出现了一些具体研究各种体裁的新文学作品如何创作的文章。如胡适的《谈新诗》,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周无的《诗的将来》,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周作人的《美文》等,都力图结合新文学的初步实践,借鉴外国文学创作经验,对各种文体创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在这些有意义的讨论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于新文学的见解。如1919年底李大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心理中”,不但要清除“科举的”即封建主义的“旧毒”,而且要清除“商贾的”即资本主义的“新毒”,而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大约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现的一篇试图以唯物史观考察文学历史现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文学创作的文章。这种思想观点比之文学革命初期发难者的



理论主张,显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文学革命的实绩更集中的体现还在于创作方面。1917年2月,在刊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起手”于“民国五年七月”的新诗“尝试”之作。^①不到1年,即1918年1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诗9首,标志着白话新诗的诞生。4个月后的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筑起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接着,《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上连续刊发了一批新文学作品,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药》,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即《一生》);诗歌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匪徒颂》等。这些作品塑造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即普通的农民、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形象;表现的是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新主题;在艺术上,则努力摒除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广泛吸取运用了外来的多样化的文学形式和手法。这些作品的成功在文坛上和整个社会激起强烈反响,标志着文学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至此,文学革命已经超越了初期着重理论探讨的“务虚”阶段,真正显示了具体的、实质性的成就与力量。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带来了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变革、大解放。文学革命确立了表现人生、表现自我、反映时代的积极的文学思想,彻底否定了与整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体系紧密相连的“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传统文学观。文学革命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普遍表现出尊重人、尊重个性发展的民主精神,以及尊重科学、文明,希望社会进步这样一些现代意识,充满了觉醒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并逐渐朝着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汇合。新文学的艺术表现对象,也从封建时代文学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近代文学中的官僚商贾、政客妓女,一变而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普通的农民、工人、市民、知识分子等,并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来写他们。这就使新文学不仅与封建旧文学尖锐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和近代以来一般地反映世态,要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用贴近现实生活的白话写作,在文学结构、文学体裁、创作方法、叙事角度等各方面

^①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8集,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广泛地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使得新文学更加适合于表现现实生活,接近人民大众,既与世界文学发展相联结,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崭新时代的扉页,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

文学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带来了新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繁荣局面。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首揭“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等,也都是综合性社团的思想文化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刊物,是从1921年才开始出现的。新文学社团的建立和纯文艺刊物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学已从一般的文化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转向大批继起响应者侧重建设新文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的开始。

在众多新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为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他们先后在上海等地开展活动,把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以后又陆续创办了《诗》月刊、《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编辑出版丛书近百种,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成员后来发展至一百多人,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有分会,分会在当地也有刊物。同年7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留学生在日本成立了创造社。他们最初在上海出版丛书,1922年起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成员人数也曾多达数十人。

此后几年,紧接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大批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间,全国已有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编辑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已激增到100多个。如在北京,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林语堂等组成的语丝社,创办了《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并因倡导这种文体而被名为“语丝派”;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有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等在鲁迅支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它先与别的社团成员合办《莽原》周刊与半月刊,后又独立创办《未名》半月刊,并出版过3种丛书;还有杨晦、冯至、陈炜谟、陈翔鹤等组织的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热心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方面,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集中反映了“五四”之后知识青年的生活和苦闷忧郁的情绪,富于感伤的浪漫主义特色。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都曾参加过的新月社,新月



社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但上述成员都曾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活动,在新诗尤其新格律诗的写作与“创格”以及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等方面颇多建树。他们曾以《晨报副报》为依托,创办《诗刊》、《剧刊》,稍后又办了《新月》月刊。在上海,有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应云卫、谷剑尘、洪深等组成的上海戏剧协社;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并出版《南国》半月刊。还有高长虹、向培良相继活动于北京、上海的狂飙社,曾两度出版《狂飙》周刊。此外,还有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在杭州组织的湖畔诗社,出版同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和刊物《支那二月》;赵景深、焦菊隐、于赓虞等人在天津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李春崖等在长沙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刘大杰等在武昌组成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等。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蜂起,培育锻炼了大批新文学作者,促进了创作的发展,也推动、催化了不同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从整体上丰富了新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19年至1925年间,就接连三次与复古主义思潮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与斗争。第一次是发生在1919年初的与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当时,北京大学旧派人物办起《国故》杂志,作为向新思潮和新文学反攻的阵地。林纾首先发难,他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大加挞伐,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并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诅咒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支持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希望“伟丈夫”荆生即北洋军阀出来干预镇压他们。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鹤卿)、李大钊、鲁迅都曾撰文,予以揭露、批驳、讽刺,《新青年》全文转载了《荆生》,并刊文逐字加以批驳。斗争以林纾“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的哀叹告终。第二次是与“学衡派”的论争。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力图把外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拼凑起来,对文学革命,对新思潮的介绍和新文学的传播心怀怨恨,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鲁迅首先写了《估〈学衡〉》,对他们早被驳倒的复古论调不屑一顾,而着力抓住他们文章中的“硬伤”,揭穿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老底,指出他们根本不配谈“国粹”。许多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也先后撰文加以批驳。“学衡派”实在无法与新文学阵线抗衡,只好草草收场。第三次是击退“甲寅派”的反扑。1925年7月,身为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将停刊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为周刊,办成了专门反对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新思潮和新文学的“半官报”。他在《甲寅》周刊上先后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集中攻击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企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



等角度来证明文言文的优越。一些守旧派人物也发表文章附和章士钊。新文学战线不分社团、流派、艺术倾向,来了个全体总动员,全面迎击。高一涵、成仿吾、徐志摩、郁达夫等都撰写了很有分量、有理有据的批驳文章,显示了新文学战线理论水平的提高。鲁迅在斗争中接连撰写了《评心雕龙》、《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答KS君》等多篇杂文,揭露“甲寅派”提出的“读经救国”、“废弃白话”,其实也并非真要“救国”,不过是作为“阔人”们愚弄群众的“偶尔用到的工具”。这些文章显示了更深刻的思想力量,以及雄辩的风格和渊博的学识。在新文学运动的沉重打击之下,随着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甲寅派”也就销声匿迹了。经过这三次较量,复古派皆以败北告终,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脚跟站得更稳,此后虽然不时有些复古主义的“回潮”,但已无法兴风作浪了。

新文学战线在与各种复古思潮斗争的同时,本身也逐渐在发生分化。最初共同倡导文学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随着“五四”以后阶级斗争的激化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分别走向不同的方向和道路。经过分化斗争,新文学队伍不是削弱了,而是更精锐纯正,战斗性更强了。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二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所使用的“30 年代”这一概念,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物理时间概念。通常所说的“30 年代的文学”,指的是从 1928 年至 1937 年“七七事变”这段时间的文学。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为开端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共合作局面破裂,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群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要求的,就不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斗争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是要求占领整个文艺阵地,使文艺自觉地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这一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了新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从 1928 年 1 月起,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人分别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上发表文章,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接过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以来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文学团体所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旗帜鲜明地宣布“个人主义的文艺老

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① 这标志着现代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常称之为现代文学的“30年代”。当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除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等创造社成员外，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组成的太阳社，洪灵菲、杜国庠等组成的我们社。倡导者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家应当“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②

这些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提出了艺术形式尽可能大众化的要求。但由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世界观大多处于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一时还不能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的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不时地会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表现出来。例如，有的人把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斗争作为文学反映现实的唯一内容、唯一角度，把文学的功能、作用归结为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实践作用，无形中夸大或者说是曲解了文艺的作用；有的文章甚至出现了文学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作家可以“超越时代”之类具有唯心倾向的说法；文学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性也被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意志在作品中的直接宣示，因而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作用时，忽视文艺自身的特征，忽视生活经验对创作的重要性，以致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要接近口号标语，而且常常是从‘标语口号’的形式里收到了煽动的效果”^③。加强文学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联系，本来应为文学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开拓新的广阔天地，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却被一些带有偏执、片面性的理论导入一个狭窄的范围。思想认识上的偏执和片面，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倾向，其突出表现就是将他们所认定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封建余孽”^④等作为主要革命对象，把斗争矛头指向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茅盾等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家。这就引发了新文学阵营内部，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为首的另外一些革命文学家为另一方的长达一年多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对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双方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无产阶级文学，怎样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存在着较大

① 麦克斯(郭沫若)：《英雄树》，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

②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③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载《拓荒者》第1期，1930年1月10日。

④ 参见《流沙》创刊号《前言》，1928年3月15日；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的分歧。论争中虽然双方都有一些攻讦驳难的文字,但大部分文章还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和阐发,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研究和倡导的。通过论争,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初步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质和任务。

论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和正确引导下,于1929年结束。1930年2月,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代表共同召开了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中心的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同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以及远在日本的郭沫若、茅盾为共同发起人。成立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左联”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胡风、阿英(钱杏邨)等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理论著作,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白莽作〈孩儿塔〉序》等序跋,茅盾的《徐志摩论》等系列作家论,胡风的《林语堂论》等作家作品评论,周扬、冯雪峰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阿英关于现代小品文的研究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尝试,对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创作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建立,势必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他落后的、反动的文艺思潮的抵制、反对与破坏。“左联”在团结革命作家、进步作家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斗争、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先后与旨在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的“新月派”,与由党棍、特务、警察拼凑起来的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等派别,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错误主张作了斗争,并对标榜“自我表现”而实为逃避黑暗社会现实的林语堂、周作人等论语派“性灵文学”进行了批判,与强调文学和时代、政治保持“距离”,追求所谓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的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沈从文展开了论辩。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并未止息。继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之后,1935年—1936年间,还发生了周扬、郭沫若等倡导的“国防文学”与鲁迅、冯雪峰、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争的内容虽然是两个文学口号,但实质上却是由于双方对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具体的战略和策略的认识不同引发的。



这场论争的结果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周瘦鹃、林语堂等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新形势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下一阶段——抗战与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发展做了充分准备。

三 抗日战争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

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开幕,12年间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伟大而又艰苦卓绝的战争。这是中国处于战乱动荡的非常时期,又是中华民族从血与火中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肩负起特殊的使命,并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前两个年代的文学风貌。抗战爆发后不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除部分作家在上海租界“孤岛”内坚持进步文化活动外,大批文学工作者纷纷从上海、平津、东北等地汇集于武汉三镇,武汉成了战时文化中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当选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历时8年,出刊71期,是贯通抗战时期的唯一文艺刊物。为抗战服务,成为当时不同倾向的文学家们的共识。抗战爆发之初,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小型化、轻型化了,以便“下乡”和“入伍”。街头诗、朗诵诗、诗传单、街头剧、速写小说成为风行一时的文体,一般都有比较强的纪实性、鼓动性。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声。可以说,新文学从诞生以来,还从没有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所产生的这些作品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创作还普遍存在热情很高而反映生活的深度不够、政治鼓动性很强而艺术感染力相对较弱的通病。这些不足之处还有待于随着整个抗战的形势发展而逐步得以克服。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而国民党政府却连续制造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之后,更是变本



加厉地限制、镇压国统区的进步文艺活动。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逆转,社会心理、时代氛围也随之而变。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的“低气压”,使得坚持抗战文学活动的作家们陷入痛苦的反思,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思路。抗战文学中普遍的爱国主义主题,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抗战初期文学作品中那种盲目的乐观和一般的激昂呼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于抗战形势下新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与批判。小说《腐蚀》、《淘金记》,话剧《雾重庆》等作品,揭露、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再现了“大后方”的种种积弊,以及低抑、庸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社会气氛对人们灵魂的诱蚀,使得前一阶段由《华威先生》开始的揭露抗战初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进步文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还有些作家则“回归”或依托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人物,或描写抗战现实,或再现往日的生活,从中探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传统的得失,实际上是以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为抗战、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服务。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家》等,都属于这类杰作。国民党政府钳制言论、加紧文化统治的倒行逆施,又促成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些作品借古喻今,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共反人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卑劣行径;同时也是从漫长的历史中,寻找民族脊梁,发掘民族美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借鉴。与上述内容、风格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自觉追求“史诗意味”的长篇小说、多幕剧以及长篇叙事诗、抒情诗的大量涌现,并且成为本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的“长篇巨制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与文学思维空间的拓展。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由此在国统区内掀起了“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热潮,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面对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腐朽而疯狂的统治集团,嘲讽的主调和喜剧色彩成为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钱钟书的《围城》、沙汀的《选灾》、张恨水的《八十一梦》、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袁牧之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无不妙语成讽,充满喜剧性。喜剧性是敏锐地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动的作家们对黑暗统治最后的疯狂性、荒诞性的彻底否定、蔑视与嘲弄。中国现代文学在开朗的笑声中踏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国统区文学是伴随着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完成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文艺思想斗争比二三十年代更激烈也更频繁。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中